

# 言語關注對粵普中介語語音的影響

## ——來自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分析報告

何麗芳

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中心

自 Selinker 於 1969 年首度提出「中介語」(Interlanguage) (Selinker, 1969, 1972)，並於 1972 年以「中介語」為名發表了頗具影響的文章至今，中介語在語素、句法等方面的研究經驗和材料，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而語音領域，則還是一塊有待開發的處女地。

套用 Selinker 中介語的概念，粵普中介語，就是粵方言區的人在學習普通話過程中，對於目的語的規律所做的不正確歸納和推論而產生的一種語言系統。它既不同於粵方言，又區別於普通話，這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都有所表現。粵方言與普通話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語音上。本文嘗試從語音層面，探討影響粵普中介語的因素。

學習者採用怎樣的中介語變體 (Interlanguage variety)，一般認為是由語言情景 (Linguistic context) 或社交情景 (Situational context) 決定的。前者是指圍繞語言內部結構而產生的中介語變體，後者，也就是社交情景的影響，是指學習者隨著社交中對象、場合、語體的改變而改變其中介語的使用。拉波夫 (William Labov) (1972) 曾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根據對紐約市居民發音的調查，創立了「語體連續體」的概念：無拘束的談話為連續體的一端，代表隨意講話場合所使用的語體；朗讀詞語為連續體的另一端，代表言語時需要較多關注的正規社交場合的語體。拉波夫的研究確定了語言變體與社交語體、說話人對言語關注程度三者的相關聯繫——說話人使用不同的語體時，對言語的關注程度不同，它決定著社交中語言的具體使用。

拉波夫的研究並非針對第二語言習得，但基於這一研究得出的「語體連續體」的概念，卻引起了第二語言習得研究者的廣泛興趣並用來解釋中介語的起因。Dickerson 通過考察英語為第二語言的 10 個日本人 9 個月中對 /Z/ 的發音，發現當學習者在「朗讀詞語」時，自我監察的程度較高，發音比較接近目的語；而在「朗讀對話」和「自由表達」時，自我監察的程度依次減低，語音偏誤依次增多 (Larsen-Freeman, 1991)。Tarone (1988) 應用

社會語言學的理论架構，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基礎上，對社交情景影響中介語變異的論題進行了歸納：不同語體對言語關注程度的要求不同——關注越少，中介語所表現出的系統性就越弱，變異越多。

## 二

普通話水平測試自1996年在香港推行以來，一直是判定香港人普通話語音水平的重要工具。測試中詞語朗讀、篇章朗讀、選擇判斷、按題說話等項目，是考察學習者在社交情景中對言語自我監察程度的最常用的語體。測試以語音為主，測試的性質和模式，與筆者希望考察不同語體中言語關注程度對粵普中介語的影響所依賴的資料，十分相符。

本文的分析材料取自香港教育學院第十一屆普通話水平測試(2002年7月)記錄。測試中的「雙音節詞語朗讀」、「篇章朗讀」和「按題說話」三項被抽取作為考察粵普中介語的三種語體。應試者在做「雙音節詞語朗讀」(朗讀雙音節詞語50個)時，對語音的關注度為最高；做「按題說話」(根據抽籤確定的話題，在沒有文字憑藉的情況下，單向說話3分鐘)時，對語音的關注度為最底；「篇章朗讀」介乎兩者之間。「篇章朗讀」又分為「規定篇章」和「非規定篇章」，前者從《測試大綱》第五部分朗讀材料(1-50號)的指定20篇中任選(前300個音節)，應試者對這部分測試內容相對熟悉，一般會有不同程度的準備；後者是《測試大綱》以外的一篇短文(前300個音節)，應試者即興發揮，朗讀時對語言的自我監察比前者要高。應試者都是在學校不同程度地學習過普通話的成年人。

考察對象選自測試中成績分別為一乙、二甲、二乙、三甲、三乙的五位考生，母語皆是粵方言。五位應試者的得分接近其所屬等級的中間值，代表著五個等級的普通話水平。成績為一甲者不在考察範圍之內，它代表普通話的「標準」水平；不進級者因為程度相差懸殊，也不列入本文考察範圍。

### 1· 測試中三種語體的總體語音表現

表一列出了五位應試者在三項測試中的平均失分率(失分率=單項失分/單項總分)。三項測試各佔總成績100分中的20分、30分和30分，分別以語音錯誤和語音缺陷、語音錯誤和方言語調、語音面貌和詞彙語法等方面為依據扣分，後兩項還從停頓和流暢方面酌情扣分。扣分依據隨著測試中語體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但都是圍繞普通話語音水平進行的整體考量。測試中，從「雙音節詞語朗讀」、「篇章朗讀」到「按題說話」，應試者對言語的關注程度依次減低，我們看到，各項的失分率是依次增高的。也就是說，測試者的語音表現，隨著對測試內容的關注程度的降低而降低。

表一：「雙音節詞語朗讀」、「篇章朗讀」和「按題說話」的失分情況

	雙音節詞語朗讀 (%)	篇章朗讀 (%)	按題說話 (%)
平均	15.3	16.4	26.7

## 2. 各等級應試者在三項測試中的字音偏誤比較

不同等級的應試人在三項測試中的字音偏誤(本文指測試中被評定為錯誤或缺陷的音)，表二進一步做了比較：

表二：各等級在三項測試中的語音偏誤比率\*

等級	偏誤比率	雙音節 詞語朗讀 (%)	篇章朗讀		按題說話 (%)
			規定篇章 (%)	非規定篇章 (%)	
一乙		5	1.3	2.6	2.7
二甲		14	5.3	6.7	6.6
二乙		15	6	7.3	7.7
三甲		26	7.7	11.6	12.4
三乙		40	11.7	13.3	14.4

\*偏誤比率=偏誤次數/音節個數，例一乙的雙音節詞語朗讀一項，語音偏誤5次，音節個數為100，偏誤比率為5/100=5%。「按題說話」3分鐘，以450音節計。測試評分中，「篇章朗讀」和「按題說話」不設「缺陷」一項，為了便於比較，表二計算在內。朗讀中的漏字、添字亦計算在內。

表二顯示的結果，並非完全如我們所預測的那樣，從詞語→篇章→說話，偏誤比率依次增高，它與表一有所出入。數據顯示，「雙音節朗讀」的偏誤比率是最高的，而對言語關注程度排第二位的「規定篇章朗讀」，偏誤比率卻最底。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筆者認為：

1) 「雙音節詞語朗讀」100個音節的聲、韻、調分佈均勻，舌尖後音、舌尖前音、舌面輔音所佔比重分別為13%、11%和12%，這些都是粵方言區人的難點，也是測試中偏誤比率較高的音；

2) 「詞語朗讀」出自《大綱》中的「表一」和「表二」的共約15000條詞目(除去兩表中重複的詞目)，其中「表二」所針對的是中等或以上教育程度、以普通話為職業語言或工作語言的人，而「表一」的量約為「表二」的兩倍，這就意味著有些偏誤並非語音問題，而是應試者文化程度的限制造成的；

3) 「規定篇章朗讀」部分，範圍相對較小(該屆為20篇，每篇300音節)，應試者試前投入準備的時間往往卻是多的(對此沒有統計數據，根據是筆者的輔導經驗)；

4) 篇章和說話中的語調、停頓、語速、輕重音等屬於「語音面貌」範疇的缺陷失分，表二沒有計算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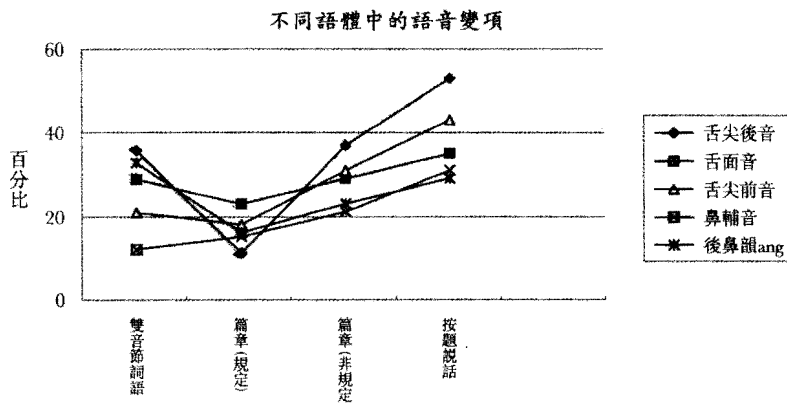
排除上述現象及與此相關的因素，由表二我們看到，從篇章(規定)一篇章(非規定)一說話，語音偏誤比率是依次增高的。

篇章(規定) < 篇章(非規定) < 說話  
 關注度高—— 一關注度低

表二還顯示，從一乙到三甲，等級越高的，其語音偏誤受言語關注的影響越小。從縱向來看，我們可以理解成不同階段學習者的語音偏誤反映其中介語所處的狀態。Corder (1981) 將學習者的語言偏誤按階段歸為三類：1) 前系統偏誤 (Pre-systematic error)，它的特點是無規律性，通常發生在學習者最初接觸新的語言知識並對此進行探索和歸納時，出現的偏誤自己意識不到，需要別人指出；知道了也不能自行糾正。2) 系統偏誤 (Systematic error)，它具有明顯的系統性，即學習者反復出現同樣的偏誤。這一階段的學習者對目的語的某個語言知識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知道自己的錯誤，但仍然不能糾正。3) 後系統偏誤 (Post-systematic error)，這是學習者已基本掌握了某個語言知識後出現的少量的、自己能夠意識並糾正的偏誤。普通話初級階段的學習者(等級為三的應試者)表現出的大多是前系統偏誤，偏誤多，類型廣；中級階段的學習者(等級為二乙、二甲和部分三甲的應試者)，大多偏誤集中在某一種或少數幾種語音變項(variable)上，表現出明顯的系統性；高級階段的學習者(等級為一級和部分二甲的應試者)，由於對語言知識有了比較好的掌握，語音比較穩定，無論是在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語體中，表現出的言語關注與偏誤的關係不太明顯。

### 3. 語音變項在不同語體中的具體變化

在表二的基礎上，我們選出偏誤比率最高的五(類)個音(語音變項)：舌尖後音  $j[t\zeta]$   $q[t\zeta']$   $x[\zeta]$ ，舌尖前音  $z[ts]$   $c[ts']$   $s[s]$ ，舌尖後音  $zh[t\zeta]$   $ch[t\zeta']$   $sh[s]$ ，鼻輔音  $n[n]$ ，後鼻韻  $ang[an]$ ，根據它們在三種語體中的偏誤情況，進一步考察言語關注對中介語的影響。



從上圖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各變項在不同語體中的偏誤比率不同，但與表二顯示的結果相一致的是，除詞語朗讀外（表二已做解釋），「連續體」由正式語體一端移向非正式語體一端，比率是逐漸增高的，這表明應試者的偏誤比率隨著對言語的關注程度的降低而增高。

舌尖後音增高的幅度最大，在「按題說話」項的比值達到 53%，說明它在自由的非正式的語體中的偏誤是最多的，在「非規定篇章朗讀」一項中也是高居各變項之首位，而在「規定篇章」項中卻並不在相應的高位，反在最底位，僅 11%。我們不妨可以推論：舌尖後音總體來說是應試者最薄弱的一類音，而應試者多數都是知道的（自我意識或通過老師）。「規定篇章」的朗讀，無論在試前操練或應試過程中，應試者對此音的關注要比其它音多，這一變項在該項測試中表現出來的偏誤比率是最底的。這一點恰恰表明，言語關注對粵普中介語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這與 Tarone 的結論是一致的。

圖表顯示的另一個現象我們也同時注意到，雖然五個變項的比率都隨語體的非正式化而增加，但與舌尖後音相比，有些變項增加的幅度比較平緩，其中舌面音  $j q x$  最為明顯。從數據上做直觀地解釋，我們可以說它受語體及其所要求的關注程度的影響較弱。進一步分析錯誤的原因，我們不難發現，粵方言沒有舌面音，學習者常常用粵方言中的舌葉音和舌尖音的發音部位來發普通話的  $j q x$ ，發出來的有尖音，但又不全是舌尖音，結果是帶有尖音的舌面音。學習者理論上知道兩者的區別，但還沒有真正掌握發音要領，一時不能糾正這一偏誤，表現出的是系統性偏誤的特徵。在「詞語朗讀」乃至試前充分準備過的「規定篇章朗讀」中，儘管意識到問題並對此（類）音倍加關注，仍然不能避免偏誤的發生，因而各項測試中偏誤比率表現出的差異不明顯。

### 三

本文的結果建立在小型數據統計的基礎上，它有待更大規模、更多數據的研究來證實，但應試者在三項測試中的總體語音面貌的表現、各等級學習者語音偏誤在三種語體中的分佈比率，及對具體語音變項在三種語體中的細緻考察，本文得出的結論是支持言語關注使學習者的中介語更接近目的語這一論斷的。水平測試項目的三種類型，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學習者對言語不同程度的自我監察的可能性，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應試者的中介語隨語體及語言水平的不同而產生的差異。

當然，因為水平測試並非為是項研究而設計，研究中所依賴的測試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試前準備的影響，並不單純地反映應試者的普通話語音能力，這導致我們的數據產生偏差的可能性，這是本文取材的限制所在。

假如數據的偏差不足以影響到我們的結論，即學習者的中介語，隨著最受關注的正

式語體向受到最少關注的非正式語體的過渡，與目的語普通話的偏離是漸遠的。也就是說，學習者通過監察和關注他們的言語而獲得目的語的知識系統，這在某種程度上，為克拉申 (Krashen 1985) 的語言監察模式 (Monitor Model) 提供了又一實證性依據。

### 參考文獻

Diane Larsen-Freeman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London Group HK Limited, 1991.

Selinker, L.: "Language transfer." in *General Linguistics*, Vol.9, No.2, 1969.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in *IRAL*, Vol.10, No.3, 1972, p219-31.

S.Pit Corder: *Error Analysis and inter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Tarone, Elaine: *Variation in interlanguage*, London : E. Arnold, c1988.

William Labov: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劉照雄主編：《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魯健驥：《對外漢語教學思考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

附記：本文資料由香港教育學院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提供，謹此致謝！

**【本文屬專著類】**